

谢冕 唐晓渡 主编

归来者诗卷

鱼化石或悬崖 边的树

当代诗歌潮流回顾·写作艺术借鉴丛书



互相被发现
去年冬天
老去的是时间
我认识的少女已经死了
我是一颗早熟的枣子
悬崖边的树
欢乐与痛苦的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边上的树》 陈其南 著

鱼化石 边上的树

陈其南 著

或悬崖



北京联合大学出版

鱼化石或 悬崖边的树

●归来者诗卷

主编：谢冕 唐晓渡

编选：谢冕

(京)新登字 160 号

责任编辑:马朝阳

封面设计:孙琳

责任校对:李茵

责任印制:蒋福彬

当代诗歌潮流回顾·写作艺术借鉴丛书

鱼化石或悬崖边的树——归来者诗卷

主编 谢冕 唐晓渡

编选 谢冕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保定满城文斋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625 字数:240千

1993年10月第1版 1993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

ISBN7-303-02996-6/I·315 定价:8.50元

总序：朦胧的宣告

谢 冕

中国新诗的历史新纪元的第一页，选择在本世纪 70 年代结束 80 年代开端的社会转换期掀开。日后的事实证明，这一段时期不仅具有社会学的意义，也具有诗学的匡正和开拓的意义。30 年代以还非诗倾向的滑行及陷落的危境在这个时期得到抑制；五四新诗运动最初十年建立起来的自由创造的格局得到修复；经过大约十年的奋斗，获得解放的新诗迎接并战胜了欣赏和批评惯性的阻扼，终于在其势汹汹的围困和责难之中建立起如今这样一个独立的和多元的诗秩序。80 年代中国新诗终于成为自有新诗历史以来最有纪念意义的一个事件而载入史册。

对非诗化的匡正是这一时期诗建设最为艰苦的工程。由于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诗不得不在实用与审美之间徘徊并做出选择。其结果当然是愉悦心灵与陶冶情致这样一些空灵轻松命题的逐步放弃。诗并不情愿事实上也难以承受地肩起挽救社会危机的重负。这一滑行的过程是漫长的，但却更是严酷的。待到 70 年代末，人们反顾这一昔日竞艳繁采的园地已是满目荒芜的肃杀景象。80 年代的诗工作者几乎就是荒郊野地之中的拓荒者。

开始的工作是清理那一片被野草毒藤所盘缘的地表。极端的为政治服务的提倡驱使诗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走上被称为“假、大、空”的绝路，谎言和矫情的充斥

造出了较之先前的标语口号和公式化更为恶劣的景观。文革结束后对这领域积垢的清理,以诗的诚实和诗人的讲真话为第一目标。当然那时所谓的真实的声音依然是社会政治层面的,但对于专横和阴谋的揭露和控诉大体传达了全社会的情感和情绪。这对当日的诗来说,是跨出虚妄和纠正历史歧误的重要一步。

在前述关于诗必须真实表达时代、真实表达人生的倡导下,由70年代转向80年代的社会转型期,出现了中国新诗史前所未有的动人现象。长期受到摧残和压迫的精神乃至肉体的痛苦和凌辱,由于新时代阳光的照射,迸发出对突如其来的死亡后再生的惊喜,以及痛定思痛的悲愤和沉哀混合的激情。

这种激情借助于被我们称之为归来主题的概括,得到鲜明、完整、充溢着时代氛围的实现。有失落和离散方有归来,归来是苦难结束后对于伤痛的抚摸以及对于历史变乱的控诉和反思。悲苦交集、感慨唏嘘的归来,是多种多样的复杂经验的情绪结晶体。个人和家庭、社会和时代的林林总总,在归来的命题中得到立体的综合的呈现。

在那个灾难和悲苦的年代,几乎所有的人都有失落,因而也都有寻找和追怀。但对于当日中年以上的人,在这样以十年为低限的历经离乱、并作为幸存者的归来,最为让人怦然心动。十年一梦的醒来,瞬息间人过中年,许多黄金般的年华有如逝水。要说这时期有关诗的真实性的吁求,以及社会层面的对于灾难制造者的谴责的揭露,虽然造成过一时的轰动,但具有长久魅力的,却是这种溶解

时代悲风于个人命运之中的悲愤的惊呼与哀伤的低语。一批诗人劫后余生，或返謁故园，或伤悼逝者，或对影悲怀，形诸诗章，创作出了自有新诗历史以来生发于个人遭际而指归于时势苍凉的可以感天动地的诗篇。

这些诗章的社会历史价值无可置疑，其在艺术创造领域的贡献，则集中于受到扭曲和变异的新诗艺术传统的修复方面。经过一批诗人的努力，这个时期的诗作在传达凝结着时代和个人大悲欢的同时，新诗固有的艺术品质有了鲜明生动的恢复和重现。但这一切毕竟是长久的变故之后短促时间内的修正，中国新诗艺术传统的本真状态，特别是冲破艺术禁锢，使诗挣脱僵死教条束缚而迈向世界性的现代艺术运动的实践，则有待更适宜也更充裕的时机。

其实，中国新诗在黑暗年代陷于绝境之时，诗歌变革的岩浆已在地层深处集聚奔突。它只待那一个契机的到来而以炽烈的爆喷冲出地壳。最初赋予新潮诗以“朦胧诗”的指称的，是一个明确的贬损的意图。批评者完全不能理解、当然也断然排斥这一诗潮所传递的艺术变革的信息及实践。他们认为凡诗都应当如他们所习惯的那样一览无余和千篇一律，他们不能忍受这种远离他们审美习惯的不适应与不可知。但新诗史上一场巨大的变革就是这样不顾艺术惰性的拒绝而悄悄来临。

新诗潮以不同于传统诗艺的方式出现在中国诗坛。它从古典的羁绊中挣脱而与流行于世的现代主义潮流对接。意象的营造、组合和叠加突出了诗的象征和暗示的特

性,主题和意义不再是明确的和单一的,它们摒弃浅露的直接外现,而把丰富的意蕴隐藏,蕴藉于是成为基本的传达方式。这种诗通过诸多现代的手法体现立体的深层意义,以它的不确定和多选择性而与前此风行的直接显露完全区别开来。新诗潮对诗建设的贡献之一是与五四新诗传统实行的接续与改善,新诗的本有品质于是得以重现;再就是对世界现代诗的重新交流与加入,从而推进了新诗的现代化进程,使诗的内涵和表现形式得以全面拓展。

80年代中期有了一场引起震动的诗的哗变。这一次诗艺的变革以几乎是“突发”的方式有别于传统的诗运。中国新诗在此之前的运行形态(大体总是首尾贯通的线性发展状态)中断了。主流的涌动突告消失。乱流的迸裂令人目乱心迷。这是中国新诗继“朦胧诗”运动之后的极为重大的变动,它是新诗潮的继续和发展,又是对前者内涵和艺术革命的挑战。在表面看来是漫无节制和充分随意性的多向运行中,可以辨析出这个被称为后新诗潮的运行大体有它确定的挑战目标。它不满于前行者以象征和暗喻为核心的精致的艺术运作,它们主张内容传达和形式表现都应当趋于平民化,并且寻求对于古典影响的更为坚决的剔除。

社会的开放催促艺术对于意识形态的进一步疏离。在后新诗潮的艺术运行中,诗改变了传统的为时代或为群体代言的角色而迅速地个人化。高贵的光圈消泯之后,平凡人的世俗性浮现了出来,诗进一步切近人的生存的

本来面目。诗中当然也有焦虑或忧患,但这些多半是不经意的流露,多半是经过分析体会后的获知。

80年代中叶诗所表现的对于唯美的反叛,是这一时期诗潮最让人震惊的事件。一些后新诗潮的弄潮者,似乎着意于对传统美学的作弄,他们无所顾忌地毁损原来被视为珍宝的东西,正如有人说的,如一群猴子闯进了古玩店。但他们“破坏”之中却寓有了新的诗学观念建设的意义。诗的天空一下子被拓宽了,人们从“不美”中获得了新美的概念。

诗的多元秩序的建立开了中国文学多元化的先河。这是中国新文学史迄今为止最动人的一页。打从进入30年代,中国文学运动不知不觉间开始了意识形态制约的主流化的运行。这种运行以60年代“文革”文学为表现的极致。“新时期”对于诗的真实呼唤,以及归来以后对于伤痕的抚摸,乃至新诗潮的抗议和呐喊,大体上没有改变上述那种主流形态的格局。唯有后新诗潮所展开的景观,方才证实新诗历史的秩序已得到改变。以往线性发展的主流化现象消除了,如今是乱流奔涌的纷杂。这一切,如同大河即将入海的港汊纵横,一切是混乱的美丽,一切又是充满激情的辉煌。我们不想对这段历史做过高的评价,我们只想确认如下一点:除了五四初期那一个短暂的时刻,中国新诗发展的进入常态的运行始于今日。

1993年3月31日于北京杨春园。

编选者序：转型期的情绪记忆

谢冕

一、废墟的召唤

如今我们面对的这段历史，诞生在诗的废墟之上。废墟形成的直接原因是60年代中叶开始的被叫做“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颠狂。这个意识形态的地震持续了至少十年。它造就了中国人精神甚至肉体的巨创。诗在这个历史的大颠倒中被驱赶到绝路，一切的抒情或写意都被认定为阴谋或腐朽，唯有为那种极端政治认可而又抽去了诗的真实生命的那些沉滓还在传达那个时代的邪恶意欲。但那些虚弱的喧嚣做出的是无情的宣告：缪斯的琴弦已被斩断。

这个阶段的诗无疑受到了非诗的强力威逼和蹂躏，但毕竟诗的歧变的根本原因却产生于自身。中国特殊的社会处境以及中国诗教传统，把诗的命运和社会的命运紧紧捆缚。从30年代开始，几乎不间断地出现和推进诗的主流意识。这些推进使多数的诗一步一步滑向审美变异的意识形态化。“文革”提供了烈性的催化剂，使历史累积的量升华为诗的癌变。不少诗人随后歌唱的诗的新生，指的就是在政治疯狂中猝死的诗的复活。

但诗的新生却有一个极为艰难的路程。1976年清明的抗议，是诗觉醒的第一声呐喊。但那时依然是社会良知而非诗美省思的醒悟。天安门诗歌运动所表达的意愿，甚至是纯粹政治学的而非诗学的。诗在这种政治昂扬中至多只是一种存在意义的被唤醒。社会动乱的年代，诗成为首当其冲的牺牲品。幸存的诗多数沦落为面目可憎的拙劣宣传。

反抗这种异化的动力,从60年代后期就开始悄悄的集聚。在当时流行各地的“知青部落”中出现了许多非出版物形式的诗的试验和传播。这些诗以真实的声音传达了与官方出版物迥异的诗情,异常年代中对社会和人的处境的真实感知,以及对丑恶势力的憎恨,激发了诗的新质的产生。当时成为禁书的中外优秀诗歌,特别是苏联解冻时期具有现代主义色彩的作品,在特殊年代反而有了广泛的流传。这在内容和形式上都给了探索者以新的启蒙。事实上,后来被称为朦胧诗的胚胎,已经在黑暗年代开始孕育。

80年代是中国新诗的复活节。它所展现的激动人心的诗新生的场景,系由两个方面的努力所构成:被批评家称作新的崛起的朦胧诗运动掀开了中国新诗史壮丽的一页;与此同时,是中国新诗传统艺术精神的恢复和发展,使受到至少长达十年窒息和损害的新诗呈现出生机。

关于新诗潮的涌现及其发展这一造成新诗历史性转折事件的评述和总结,将留与专立的篇章。这里我们将集中谈论中国新诗传统经受歪曲变异而得到恢复发展的事实。这是一个恢复和展延由五四先驱所开创的中国新诗传统的严肃命题,也是新诗在极端的权力施压之下未曾死亡的强大生命力的证实。对这一事实的描写将强化我们的信念并获得关于中国新诗的历史感。

二、掩埋与发现的故事

诗在以往的日子里受到政治飓风的袭击。诗人被迫纷纷倒下以至消失。残存的诗大体保持了两种形态,一是前面述及的地下状态的创造和流传,另一种则是不同形式的苟活者。掩埋的话题由此产生。在中国这个空前残酷的年代,正常的诗情变成了不能公开存在的异常者;当然,当诗人失去正常的生存空间,诗的失常以至沉沦也在情理之中。

一旦政治的禁锢得到解除,当人们重新开始寻找,首先面对的

是那一片可怕的废墟上由“假、大、空”装饰的伪诗。清理废墟的第一步工作是呼唤诗的真实性。艾青的题目是《诗人必须说真话》，公刘的题目是《诗与诚实》，这些题目对着曾经遮天蔽日的虚假而来。艾青认为“诗人只能以他们由衷之言去震撼人们的心”，他揭示“没有兴奋而要装出兴奋，必然学会撒谎”。公刘谴责诗“成了押韵说谎的艺术”，他相信，“任何一个有良心的诗人，都只会在不打引号的真理面前低头，而绝不会在打引号的‘真理’即棍子底下屈服”。

两位诗人的话都没有进入艺术，在那时，诗的内质的颠倒是最大的异化，因而所有的思考都未曾涉及诗美自身。诚实这个命题本来不是诗学辞典中的条目，而更像是社会伦理的一个范畴。我们面对这些有影响诗人如此郑重庄严的呼吁，不难想见诗自身的蜕变所达到的严重程度。

苦难是长久的积累。从本世纪 50 年代开始，人为的倾轧迫使一批又一批诗人湮没。这种湮没的规模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来愈大。开始是名称各不相同的那几个部分的诗人被宣布为异类，后来则是近乎全体的诗人。这种诗人的放逐或不作宣告的消失，是后来被我们称作“归来”的诗人群或他们的审美创造的精神的和物质的基础。近世以来无数战乱所造成的离散都没能超过 60 年代政治疯狂所具有的规模。“归来”是进入 50 年代以来历次群体性的生离死别悲剧的形象重现，不论是否有人倡导诗的真实性，幸存者在明亮的世界中回顾暗黑的来路，他拥有的很难不是发自内心的真实歌吟。

当苦难成为过去，诗人已经能够把自身经历从以往的“忘我”的停留于政治层面的状态中初步解脱。危境给个人价值的凸现以自然的契机，中国诗在这一历史转型期做了悄悄的宣告；对于个人命运关切的时期已经来到，尽管这种关于个人安危忧乐的关切仍然羁系在社会理想与社会谴责之中。

时代动乱和政治高压造成中国诗史最冷酷的一页。这一页从翻开到合上经历了数十年之久。那是一个其大无比的伤口。血泪

凝聚了当代惨烈的诗情。这是几代人以苦难为代价所进行的感天动地的创造,这种创造因年龄和阅历的差异而各有侧重。就“归来”的诗意而言,大体集中在动乱前已有相当的记忆累积者那里,这些人离乱前已经成年,他们的回忆真切而具体,这些回忆所展现的情感内涵也更为苍凉沉痛。青年一代也有自己的追寻和抚摸,但多半仅是童年的噩梦,以及少年被迫漂流的追忆。二者失落感相同,但内容的沉郁却有差别。这只要以艾青的鱼化石和曾卓的悬崖边的树对比梁小斌对于失落的钥匙的寻找便可得到证实。化石不可能还原到生命,尽管它保留了生命的形状,而钥匙却在草堆中等待它的主人;失去的岁月对于老人来说是不可补偿的临近绝境,而对于人生的初涉者却是希望的长途。

中国新诗在它的历史发展中,几代诗人创造过诸多凝聚了各自时代精神氛围的形象:涅槃后新生的凤凰,吞食太阳的天狗,烽烟中的漂泊者,以及后来的初升的朝阳等等。但以浸透的血泪的语言写出关于被掩埋的悲痛或是关于重新被发现的惊喜的,则是这一时期诗人对于中国新诗意象宝库无可替代的贡献。

三、虚假的完善与真实的残缺

50年代是颂歌的时代。颂歌时代的形成首先是权力直接或间接的倡导,但也是歌唱者自身真诚的体认。当一个衰落而失去吸引力的时代结束,而一个新颖的社会形态出现于地平线,饱经忧患的中国人以释去重负的心情迎接了它。这时候的颂歌是连同着个人的解放与社会的前进两种因素的合成。应该说,当前一因素在社会中充当主导的时候,这声音是真实感人的,但当社会的特别是意识形态的意愿成为支配的动机,这一诗歌形态便与宣传和直接的功利相联结。这种联结有可能导致对于诗美创造的侵犯甚而取代。此时,诗中呈现的完善便获有某种虚假的成份。

因而,从本世纪中叶开始在诗中出现的那种圆满的幸福感和

从中展现的完美性,逐渐演变为畸形与破损的真实替代物。人们对随后愈演愈烈的诗质异化的“假、大、空”的总归,首先表现了对虚假的谴责。这种谴责是公正而不怀偏见的。事情到了70年代末方才出现转机:那就是一批又一批受苦受难的灵魂的归来。

这些流放者关于归来诗情的营铸,喊出的是经历苦难后心灵深处真实的声音。归来的诗神进行的这一些创造性的工作将垂之久远。它使新诗由于政治无节制的干预造成的历史断裂得到修复和接续。这种工作纠正了长久的异变所给予人们的关于诗的错觉,它还原了五四前辈开辟的历史性工作的本质。

它告诉人们,新诗并不是他们所曾经习惯的那种虚假声音的充斥。诗应该是如今这样,既是时代风情的传达,又是个人哀乐的宣泄,是人的情感世界中欢愉与悲苦、灭亡与新生交织的真实情绪的结晶体。真正的诗是如今展现的这种血泪凝聚的声音。

归来的诗悄然无声地造出了划时代的辉煌。自有新诗历史以来,诗人破天荒第一次把个人命运变成了第一位的题目。的确,五四时代曾有过个性解放的诗表现,但那时个人意识的表达终极目标是实现对社会的承诺。此后漫长时期是集团意识对于个性主义的挤兑和压迫。诗对于个人的关切若没有集团的保护伞,便是自私或邪恶的同谋。

这种自我萎靡的局面促使诗一步一步走向虚妄,个人在诗中的失落宣告了真情的退却。那些以群体名分的张扬换取生存权利的赝品,最后取代了诗所赖以存在的个人情感的基础,大声喧哗的是那些与个人真实感受并无联系的最大公倍数的情绪代码。那里诚然有着对于现今秩序的满足感,以及对于未来理想的讴歌,但那些“完美”却是心灵残损或畸斜的臆造,而与个人的真实生存状态无涉。

中国社会在60年代中叶进入误区,政治的混乱造成社会动荡也造成个人命运的灾难性。对于几乎所有的中国人来说,时代的真

实乃是理想的幻失以及家庭的不幸。因而这一历史歧误的最具本质性的特征是破缺和苦痛，而不是先前人们心造的完满。一批归来的诗人以充满个人性的哀痛和狂喜冲出那一片虚妄的迷宫，终于给新诗的长久蒙尘造出了一个真实的时空。

四、残损的辉煌

20世纪中叶中国的疯狂重现了类似拉奥孔那样灾难的啃啮及痛苦的挣扎。那种肉体与心灵的经历化为了拉奥孔式的凝固的痛苦，在那刻骨的痛苦之上留下了情感风暴的刻痕。因为有无情的风，于是有摧残的花朵；因为有斧断斫和强加的捆绑，于是有变形和病态的树；因为有复仇之女神般的追逐，于是有惊悸不宁的警惕和敏感。这里所展示的美感，是以往习惯的背逆，那一片残损与破缺，是时代不幸对于诗史的馈赠。

即使在生活重新开始之后，人们依然保留了那一份使人震颤的惊恐。陷阱无处不在，它诱使无忧的灵魂悄然地落入。记得当时一位非常年青的童话诗人写过天真的小鹿被花丛欺骗而跌入预置的圈套的悲哀的故事——那是无数人间故事的精神折射。如今另有一位饱经忧患的诗人，再次向着善良的不设防的心灵发出了警号：魔鬼，不要往这里跑，你为什么莽撞地离开森林？这里，那里，依然埋伏着射杀的枪口！

告别了完美，归来的诗魂首先展现的是那一片无际涯的摧折之后的残缺和变异。这里有一棵树的故事：

不知道是什么奇异的风
将一棵树吹到了那边——
平原的尽头
临近深谷的悬崖上。

它倾听远处森林的喧哗
和深谷中小溪的歌唱
它孤独地站在那里
显得寂寞而又倔强

(曾卓:《悬岩边的树》)

这是一棵被迁移的树。迁移不是自愿的,是“奇异的风”强迫它来到那个别扭的地方:平原的尽头,临近深渊的悬崖。说别扭还近于轻描淡写,这是绝路:往前挪半步就可能粉身碎骨,是死亡之境。既然是一棵树,它当然希望有良好的生存环境:空气、阳光、水分和小鸟,但这一切都被剥夺了,它无可选择,只能接受强迫的命运。

森林的喧哗和小溪的歌唱都是遥远的故事,不属于这棵树。它与世隔绝,默默忍受孤独。“弯曲的身体留下了风的形状”这诗句以平淡说出沉痛,正因为平淡,越发显示出对于痛苦习以为常的麻木,创伤的极痛便是不痛。风在这里是暴力的象征,它的不断施加使树终于改变了原来的样子。肆虐和施暴摧残树的平衡发展,终至于畸变:是一种别扭的倾跌。要抗拒那不断的施加,需要大的毅力和坚定。倾跌和腾翔的临界状态是树的生存挣扎的证实,它的扭变则是生机与摧毁两种力量互为作用的造型。这就是我们现在概括的残损和扭变的诗意。

以往我们习见的都是那些春风沐浴的幸运的树木,如今却是这般的伤痕累累的死亡线上的挣扎。还有活得比这棵悬崖边上的树还要惨的。艾青的《盆景》写的是那些离开大地和阳光雨露的一些被迫迁移的树。艾青在这里再次谈到养花人。这里出现的养花人不同于50年代,当年那个虽然趣味偏狭但心地善良真心要扶植花朵的养花人已经消失,他也不再做梦。此刻出现的养花人留下了心理变态的记录:

为了满足人的好奇
标榜养花人的技巧
柔可绕指而加以歪曲
草木无言而横加斧刀
或许这也是一种艺术
却写尽了对自由的讥嘲。

目睹这铁丝和刀剪造出的变态和残暴，寒冬南国花市的春光并不能淡漠人们对于杀伐和虐待的不幸感受。大凡在70、80年代之交的幸存者，大概都会理解这种在欢愉时刻涌上心灵的深刻的苦痛。充分的阳光和雨露的润滋的常态的剥夺，树的生存的尴尬以及陷于绝境，是变异时代给予的伟大主题。这里的一切都是触目惊心的，但一切又都是非常真实的。

这里还有一棵“美丽”的树，它生长在七层塔顶之上，应该说，那里是一个很奇特的风景了，但对于诗人仍无欣悦。傅天琳的《七层塔顶的黄榆树》依然抒写那种别别扭扭的情怀。塔顶的树如一件高高晾着的衣衫（是衣衫，不是旗帜；是晾着，不是飘扬）。习惯的赞美和肯定的诗意在这里消失了，代替的是一种中性的，不动情感的描写。但这种“无动于衷”并没有持续多久，接着出现的是旷野以及长长的寂寞的影子，是一种阴影的拖长。

这诗是对特殊的生存境遇和生存方式的提炼：一只偶然的鸟儿的偶然的失落，一颗籽粒不偏不倚地落到了“砖与灰浆的夹缝里”，这是什么样的命运的捉弄！年青的女诗人在这里不曾控诉也不曾谴责，也许是由于女性的温柔，她认定那是一次不大不小的玩笑，也就是在那“不偏不倚”的“偶然失落”之中造就了这样奇特的生长。诗人确认它是一个“永恒的灾难”。

不论是这棵黄榆树，还是前面提到的那些不留名字树，还是牛汉的那棵倒下的枫树，它们都不意味着幸福。那些树有的受到铁